

胡 键◎著

不要误读中国



胡 键◎著

不要误读中国

Don't misunderstand China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要误读中国/胡键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310-9

I. ①不…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概况 IV.
①K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5417 号

不要误读中国

作 者: 胡 键

责任编辑: 杨 国 王晨曦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10-9/K · 211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他者”的误读.....	1
一、崛起的中国必然成为世界的聚焦	2
1. 中国崛起方式是如何超越的	2
2. 世界重新聚焦中国	5
3. 西方不习惯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	7
二、西方有色眼镜中的中国	8
1. 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一个硬币的同一面	9
2. “中国威胁论”,还是“威胁中国论”	11
3. “中国崩溃论”是怎样崩溃的	13
4. 不是中国傲慢,而是西方有偏见	15
三、盲人摸象:不一样的中国	17
1. “美国意象”与“美国的中国”	17
2. 欧洲中心主义与“欧洲的中国”	19
3. 偏见源于文化的差异	20
 第一章 中国角色:从“与生俱来的挑战者”到“利益攸关方”.....	23
一、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摧毁了殖民体系,西方却在全世界 发起了冷战	23
1. 面对西方的工业文明,中国输在文化弱势上	24
2. 近代中国的角色定位:中国向何处去	26
3. 西方对东方的冷战,中国没有“骑墙”的可能	29

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但崛起者却总是要挨骂的	31
1. “挨骂”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成本	31
2. 并非都是中国惹的祸	32
3. 走自己的路,且告诉西方怎样说中国	35
三、“世界老二”,不能跟美国成为世界“二老”	36
1. 中国淡看“世界老二”	37
2. 慎言“中美国”	41
3. “利益攸关方”,还是“责任攸关方”	42
 第二章 中国形象:从《马可·波罗游记》到《中国大趋势》	45
一、把中国“乌托邦化”和冠以“野蛮的东方性”,都是西方的偏见	45
1. 把中国“乌托邦化”:西方视野中的理想之国	46
2. 野蛮的东方性:中国形象从另一方被扭曲	48
3. 钟摆再次转向了对中国的赞誉	51
二、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狂热症”,都会对中国产生错误的认知	54
1. 文化落后需要文化革命,但不能走向文化虚无主义	55
2. 大国成长需要克服文化“狂热症”	57
3.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另类“狂热症”	59
三、“中国制造”不能代表中国形象	61
1. “Made in China”并非都是“Made by China”	61
2. “中国制造”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62
3.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形象提升	64
 第三章 中国式民主:民心与民愿的统一	67
一、民主是普世价值	67
1. 西方抢占着民主的话语优势	68
2.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	70
二、民主有不同的实现形式	72

1. 西方民主并不代表普世价值的民主,只是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	72
2.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被苏联搞坏的	75
3. 中国经受不起“西方民主”的折腾,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搞民主	80
三、中国式民主的实质:民情、民心、民愿	82
1. 中国民主决策:始于民情、成于民心	83
2. 中国民主决策:服务民愿	85
3. 中国民主政治运行:极力规避权力腐败	86
第四章 中国模式: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	94
一、中国模式:强调的是“中国”,而不是“模式”	94
1. 不必害怕谈中国模式	95
2. 为什么要用中国模式	99
二、中国模式,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开端	101
1. 中国现代化道路最初是“摸着石头过河”	101
2. “摸着石头过河”仍然是中国模式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特征	103
3. 中国模式的未来是“埋下石头再过河”	104
三、中国模式是中国现代化时空条件下的产物	107
1. 中国模式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更不宜把它政治化	107
2. 中国模式不是儒家模式,不宜把它儒家化	109
3. 越来越多的国家学习中国模式,并非中国刻意输出中国模式	110
第五章 文化发展:重拾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	112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	112
1. 以天地万物为核心的人本主义	113
2. 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内省主义	114
3. “尚中贵和”的包容精神	115

4. “克己复礼”的礼仪主义	116
二、文化建设不只是单纯从文化来考虑	117
1. 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需要	117
2. 文化建设是国民素质提升的需要	118
3. 文化建设是净化文化空间的需要	120
4. 文化建设是大国成长的必由之路	121
三、文化强国:要跳出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的窠臼	122
1. 文化建设的瓶颈:文化资源丰富,但文化软实力弱小	122
2. 文化自负的结果是文化保守主义	124
3. 文化自卑的结果是历史虚无主义	126
4. 文化强国,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改造	128
第六章 中国变得越来越“中国”,才是真正中国	131
一、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131
1. 究竟谁是“经济流氓国家”	132
2. 中国是“孤独的军事超级大国”吗	134
3. 中国是“精神分裂的超级大国”吗	136
4. 中国是“脆弱的超级大国”吗	140
5. 中国与美国“必将成为对手”吗	143
二、中国并非永远都是“革命者”	145
1. 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	146
2. 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后,国际社会仍然异样看待中国	148
3. 进入国际体系以后,中国是负责任的建设者	153
三、崛起的中国需要美国的“战略再保证”	156
1. 美国欲打造两洋战略 2.0 版	157
2. 中国需要美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再保证”	161
3. 中国战略解困:非“突出重围”乃“和平解围”	164
第七章 保护海洋权益,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171
一、中国为什么需要海洋大战略	171

1. 海洋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密切相关	172
2. 海洋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	173
3. 海上岛链困锁遏制中国崛起	175
4. 中国海洋战略要有新思维	176
二、黄海:中国不可触动的敏感区	177
1. 黄海:中国挥之不去的痛	177
2. 美国为何欲在黄海“秀肌肉”	179
3. 美韩黄海军演将对中国构成现实威胁	182
4. 中国的目标诉求不应该被忽视	184
三、南海危机需要理性的管理模式	186
1. 南海诸岛为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186
2. 南海为什么会成为问题	190
3. 南海危机需要进行理性管理	194
4. 南海危机合作管理的制约性因素	200
第八章 G2之说,是刻意捧杀中国	204
一、“G”并不是偏向中国,而是离不开中国	204
1. 全球治理机制的缺陷	205
2. 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中心	206
3.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207
二、凡是被美国拉着与之平起平坐的,最后都是被美国搞垮	208
1. G2之说是美国的战略策划	209
2. 中国不能随之唱和	211
3. 不能忘记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	214
三、面对赞誉,中国不应该飘飘然而忘乎所以	217
1. 中国不是第一次被吹捧	217
2. 西方吹捧中国,最终的目的是要捧杀中国	219
3. 中国要有定力	221
4. 要有所作为,但仍然坚守韬光养晦	223

第九章 地缘与币缘争夺:中国周边失稳	227
一、中国周边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	227
1. 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成为美国战略东移的重要契机	227
2. 美国借反恐之机达到了常驻中亚的目的	232
3. 美国借南海危机重返东南亚	234
二、21 世纪,中美论剑币缘政治	237
1. 弱势美元是美国的“币缘经济之手”	238
2. 中国掌握的美国国债,不是“核武器”	239
3. 奥巴马力图打造“美国制造”	241
4. 货币战争是人民币汇率低估引发的吗	242

导言 “他者”的误读

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尽管它是基于笔者学术积累之上的东西，它只是笔者学术研究的“衍生品”。在从事中国软实力问题研究的过程中，总感到仅仅从学术本身来研究，不足以向国际社会说清楚：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在中西方对视的几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和相互重新认识的现实中，中国处在世界的什么位置、她将走向何方，以及她究竟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这一切不仅西方国家感到难以捉摸，而且中国自身也非常有必要向世界说明。基于这样的考虑，开始提笔思考。当然，这绝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思考。

——作者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曾经说，当您以哲学家的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您首先要将目光朝向东方。伏尔泰可能受到了马可·波罗、利玛窦等的影响，他非常推崇中国文明并认真地研究了中国的儒家思想。他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写了一部悲剧《中国的孤儿》，赞扬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and 德行，在法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伏尔泰没有错，18 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其技术成功还没有转化为生产力，相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而言，在经济上是落后的。因为东方的中国正经历着“康乾盛世”，虽是“晚秋晴日”，但当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中国走向衰落的迹象，而中国更是沉浸在“天朝盛世”之中，即便有少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给予了善意的“提醒”，也被视为“盛世危言”；西方国家也被中

国表面的繁荣所迷惑而对中国更加憧憬、更加好奇,更加想认识这片神奇的土地。

然而,几乎与伏尔泰同时代的法国另一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把中国视为一个经济贫困、政治腐败、道德堕落的邪恶专制帝国。他不仅是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第一个西方思想家,也是“从否定方面将中国列入一种世界模式的第一人”,他为法国和整个欧洲“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这种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基本前提。从此以后,西方中国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以“颂华”(sinophilie)占优转为以“贬华”(sinophobie)为主。从那时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可谓“隔雾看花”,再加上西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此“贬华”的中国观一直就是西方对华的主流思想,即便当今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西方对中国的贬斥仍然不绝于耳。

原因何在?说到底还是因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一个“他者”,而在中国人眼中,西方也是一个“他者”。作为西方的“他者”,中国就不会被西方接纳,而且西方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中国;作为中国的“他者”,西方是一个时时想主导中国的强势者,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习惯于与一个弱小的中国打交道,当中国走向崛起的时候,西方担心无法掌控中国而不愿意接纳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因此西方常常通过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话语来试图对中国崛起的进程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他者”难免不产生误读,也难免不被误读。

一、崛起的中国必然成为世界的聚焦

1. 中国崛起方式是如何超越的

中国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直至整个21世纪的重大事件。两方面的理由表明中国的崛起是“重大事件”。从纵向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崛起方式超越了历史上西方任何大国崛起的方式。纵览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它们大多完全以硬实力骤然增强的方式崛起,并且通过武力扩张而实现暂

时的霸权(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目标。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有9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崛起为大国,按照先后顺序大致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在这9个国家中,除了美国略有不同外,其他8个国家的崛起方式几乎是一样的,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以追求更大的外部利益特别是领土为根本目的;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领土利益而采取战争手段进行扩张与征服;三是由于要进行战争就必须发展自己的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因而往往是以最快的速度打破原有格局的力量平衡;四是最终要摧毁原有的国际体系而建立自己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五是上面4个特点,在它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是树立敌人或者说是设置一个甚至几个假想敌。最后也是同样重要的是,历史上西方大国的成长往往在追求物质性利益的时候忽略了国际政治的道德因素,即便有时也重视国际道义,但在当时情况下,国际法与国际道义都成为了争夺霸权的工具,都是为争夺霸权服务的。

荷兰和大英帝国虽然借助于海上贸易的力量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贸易市场,但荷兰和大英帝国也都是用炮舰为其市场利益保驾护航的。大英帝国更是用自己船坚炮利的优势护拥着毒品来到了东方,干起了非人道的勾当。所以,即便大英帝国是用市场的手段建立霸权的,这种市场的手段也比武力的手段更没有国际道义。

在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中,美国的确有某些“例外”之处。其“例外”之处在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国是在一定硬实力基础上突出展示其道德的力量而成功的,如精致的民主制度设计、多元化的国内文化、个人主义的精神乐园以及给国际社会贡献了庞大的国际认同体系等,这些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因而美国的崛起的确有“和平崛起”之成分。特别是门罗主义最直接地体现美国自乔治·华盛顿以来的孤立主义传统——“不干预欧洲事务”,所不同的是门罗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也不容许欧洲干预美洲的事务。然而实际上,美国并不会真正为美洲国家承担义务,它只是客观上“保护”了拉美国家的独立革命。在经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后,尽管美国通过这次战争走上了世界舞台,并开始参与世界事务,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仍然不敢也不愿轻易放弃保守的中立政策。一方面是因为,用威尔逊说的话是战争与美国无关,同时,美国也担

心无论同盟国还是协约国取得胜利,都有可能导致欧洲均势被打破,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所以,作离岸平衡者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试图通过与交战双方保持联系,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而这种收益对美国在“美洲体系”承担更大的责任是绝对有利的。

但是,美国真正崛起为世界大国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 20 世纪中期正式取代大英帝国成为全球霸权国。然而,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同样也陷入到武力的“陷阱”之中,两次世界大战从形式上看是当时的战争形势把美国“拖进”战争,但实际上是美国从自身利益考量而主动卷入其中的。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进行霸权护持的过程中,以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主要手段的对外行为方式,同样是家常便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到冷战结束前后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直至以反恐、反扩散为名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都表明美国仍然没有摆脱历史上西方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

沙俄之后的苏联,是在反西方殖民体系的进程中崛起的,甚至首先是在强大的软实力基础上崛起的。十月革命前,俄国民众不仅抛弃了对“慈父”沙皇的忠诚,也抛弃了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最终选择了布尔什维克,从而使俄共(布)“先天性”地获得了强大的软实力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苏维埃体制等,都成为当时世界落后民族所追逐的政治目标。但是,苏联通过软实力而获得硬实力崛起的合法性基础以后,硬实力的崛起很快排挤了其软实力,从而很快丧失了其软实力优势。特别是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苏联的大清洗运动、苏维埃制度的日益僵化、意识形态的刚性化等,都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关键性因素。

当然,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并不意味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长都逃脱不了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

中国崛起方式之所以能超越以往,这不是中国的自吹自擂,而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结论。首先,中国的崛起没有进行任何的殖民掠夺,不是靠外部资源崛起的,而是一种内敛式崛起;其次,中国的崛起不是追求外部收益的崛起,虽然中国成长过程中要不断拓展外部利益,但中国崛起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内部;再次,中国的崛起不是以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为目标和手段的,迄今为止,中国的军事实力主要用于防御,而不是扩张,中国的军事投入与

美国相比微乎其微,甚至还低于日本;最后,中国是通过经济和市场的方式进入国际体系的,因而崛起的中国不会破坏原有的国际体系,而更多的是建设既有的国际体系。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崛起是努力确保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平衡发展,确保外部环境与内部制度的协调发展。

2. 世界重新聚焦中国

国际社会第一次聚焦中国是在公元 13 世纪中期,即马可·波罗时代。从马可·波罗的游记发表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一个陌生的东方产生了好奇,而这种好奇也就成为对中国的推崇。事实上,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一直到 18 世纪中期,西方人都非常推崇中国的文化。近代著名的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就曾对中国文化大家赞扬,认为中国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1585 年西班牙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更是把当时的中国塑造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已知的治理最为完善的国家”。可见,门多萨及其代表的当时欧洲的一批宗教知识精英对当时中国的制度文明确实是推崇备至。

从《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到《大中华帝国志》,传奇式的中国形象构塑,成为西方第一次聚焦中国的产物。这种形象构塑过程中,虽然不乏乌托邦化的色彩,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实际。然而,到了 18 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 1742 年英国乔治·安森《环球旅行记》和 1748 年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出版,前者从旅行见闻的角度把中国描述为一个经济贫困、政治腐败、道德堕落的野蛮国度;而后者则在理论原则上把中国刻画为一个邪恶专制的帝国。从此以后,西方 5 个世纪持续不断地美化中国形象全面退潮,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迅速成为主流。特别是在西方殖民大国向东方扩张的步步推进,离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它们掌握“有关中国的知识”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负面信息逐渐破除了传教士美化中国的“骗局”,使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走向反面,且不断丑化中国形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作为东方和中国的征服者,更是藐视中国这个曾经被他们奉为“神奇”的国度。从那时起,西方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可谓“隔雾看花”。尽管西方一些汉学家热衷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其中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包括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自身的研究,

更多的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虽然也有一些国际汉学家尝试过关于中国对世界影响的研究,但其对中国持积极乐观看法的观点很难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主流,因为它们很快被“中国愚昧落后”、“中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等声音所淹没。

新中国建立以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更加意识形态化,西方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西方近代学者对近代中国的认知水平上,从而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知与实际的中国及中国文化可谓大相径庭。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负面消极的一面被西方社会定型化,甚至被当作中国形象及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第一次打开了西方观察中国共产党的视野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需要新的“西行漫记”,以打开西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认知的新视野。应该说,西方相当一部分学者作出了这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在美国、欧洲的重要智库机构中,活跃着一批“中国通”,包括学者、官员和学官两栖型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开启西方认知中国的新视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他们或许是开启了认知中国的一道道小缝,但毕竟从这一道道小缝中看到了中国的一些闪光,这应该说的不小的进步。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学术界越来越把他们的研究聚焦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并且推出了一些有相当影响的成果,包括詹姆士·金奇(James Kynge)的《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权力转换:中国与亚洲的新动力》、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不祥之兆: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兰德尔·帕伦勃(Randall Peerenboom)的《中国现代化:是对西方的威胁还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约舒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的《中国在想什么?》、谢淑丽(Susan L. Shirk)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罗布·吉福德(Rob Gifford)的《中国之路:一个新兴大国的未来之旅》、约翰·奈斯比特的(John Naisbitt)《中国大趋势》、马丁·雅克斯(Martin Jacques)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等等。当然,这些成果有对中国积极的看法,但其中不乏对中国仍然抱有种种成见或

偏见。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学者在中国问题上建构话语的能力非常强,从“贫困论”、“愚昧论”到“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和“统治论”等等,都一度成为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的流行术语。这些是西方重新聚焦中国的必然结果。

3. 西方不习惯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

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而西方在征服中国之后面对中国时也总是有一种特别的优越感。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祟,西方的优越感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或许还要延续下去。但是,西方的优越感恰恰也反映出西方的心虚。半个世纪的冷战,不是因为西方不愿意跟东方国家特别是苏联打交道而自我封闭起来,而主要是因为西方对苏联这样的大国太害怕了,所以在战争结束不久就千方百计不让苏联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也就是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要早日将苏联掌控起来。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年的“铁幕”不是欧洲的分界线,而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边缘。一旦跨过这一边缘,西方中心主义就会把它的价值理念、制度模式等向外扩张。苏联崩溃之后,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任何行为体要崛起为一个超越西方的强者都要被遏制。也就是说,在西方中心主义眼中只有弱者生存的空间,而不允许有强者的地盘。

苏联的解体使西方消除了当时唯一强劲的对手,但在苏联解体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中国迅速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习惯于跟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打交道的西方,用异样的眼神审视着正在崛起的中国。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中心主义历经了两种态度:最初是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崛起,因为正如西方惧怕苏联一样,也惧怕中国崛起为一个强国,从而会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然而,毕竟中国的崛起不同于苏联,更不同于其他西方大国,中国崛起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一种现实。在这种情形下,西方转变到另一种态度:把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体系,并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利益来承担了更大的国际责任,目的就是要掌控中国崛起的进程。

西方的不习惯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政治力量的变化呈现出两种相反方向的趋势。一种趋势是东方尤其是中国力量的上升趋势,另一种则是西方包括美国的衰落趋势。正如亨廷顿所说,西方的衰落是缓慢的、非

直线性的；同样，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兴起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在这种趋势的对比之下，处于下降趋势但还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总是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减缓自己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使中国这样的国家放慢其崛起的速度。那么，究竟如何来使中国崛起的速度放慢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中国施加外部的压力，包括通过制造各种不利于中国的话语，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虽然这些话语对中国崛起不会产生多大阻力，最多是给中国“挠挠痒痒”，让中国感到不舒服，使中国不得不腾出一些精力来应对。

二、西方有色眼镜中的中国

中国古代有一个“邻人盗斧”的故事，说的是自家丢了斧子，怀疑隔壁的小孩偷了。于是，他看邻居小孩走路的样子像偷斧子的，看他说话的样子也像偷斧子的，但就是没有证据。过了一年，这个人在自己后院种东西时，发现了自己的斧子，原来他当时不小心在运土的时候把斧子埋在土中了。这个时候，他看邻居小孩说话也不像偷斧子的，走路也不像偷斧子的。人有时容易对外面的事物产生一个看法和结论，并且很难去改变这样的想法和结论。“疑人偷斧”的故事说明了主观意念的干扰。知觉对象始终未变，变化的只是疑人的主观观念。当错误的念头形成后，便自然地将这个观念投射到知觉对象上，从而主观地增添了原来并不存在的许多东西。

西方看中国也是一样，西方把中国置于“异类”的“他者”地位；反过来，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相对于中国来说，西方也是一个“他者”。两者之间的陌生必然容易产生猜疑。中国对西方的猜疑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当中国自信地走出封闭之后主动地去认识陌生的西方，并逐渐熟悉了西方，此时，中国对西方的猜疑早就自我消解了。然而，所谓“开放的”西方却总是走不出自己的封闭，不愿接纳陌生的中国，而且对陌生中国的崛起更是这种猜忌，总以为中国是“另一个苏联”，所以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就成为西方必然的假想敌。